

温故

二十

主编 刘瑞琳

郭晶 门生故旧忆往中的郭廷以
朱铭 踩雷记

周孜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黄十九 二战中我在中国的经历

徐家宁 晚清中国的光与影

张耀杰 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闵良臣 胡适的最后一次英文演讲

赵网 张政烺先生二三事

谭夏阳 儿时溪头镇

毛丹 王永江致杨宇霆的十二通密信

温故 书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二十)/刘瑞琳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95-0264-6

I. ①温…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202号



鳳凰網 网络支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1 字数:160千字

2010年12第1版 2010年12第1次印刷

定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特稿

郭 晶 门生故旧忆往中的郭廷以

记忆

朱 铭 踩雷记 / 28

周孜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 40

黄十九 二战中我在中国的经历 / 53

影像

徐家宁 晚清中国的光与影 / 62

印象

朱益华 五埕坡纪事 / 69

钱勤来 好人余以文 / 84

赞

- 张耀杰 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 88
闵良臣 胡适的最后一次英文演讲 / 106

人物

- 赵 细 张政烺先生二三事 / 113
高怀珠 天风海涛祭英灵
——记朱偁先生 / 116

风物

- 谭夏阳 儿时溪头镇 / 134
赵健刚 麦收时节 / 144
用 欣 书信
——有感于一种行将消失的文体 / 146

文本

- 毛 丹 王永江致杨宇霆的十二通密信 / 149
姜庆刚 一份有关抗美援朝宣传的通知 / 158

月语

- 贾振勇 郭沫若五十寿辰之际的政治遇挫 / 161
武向春 与岁月劈面相逢 / 166
刘玉真 被误读的杨荫榆 / 169

文抄

- 卢 前 小品三则
面貌册 / 39 记颜世镕 / 61 袁世凯的诡智 / 143

门生故旧忆往中的郭廷以

郭 晶

历史学家郭廷以，字量宇，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领军人物。1928年开始，郭先生先后任教清华大学、河南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期间，仅在1948年曾短期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由于郭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卓越贡献，196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七届人文组院士。

20世纪50年代中期，郭先生筚路蓝缕而开创近代史研究之重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简称“近史所”），其研究材料和成果在很长时间以来为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所瞩目，因此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巨额资金赞助；一时之盛，创始人郭廷以却未能以此萌福，晚年更为此“自我放逐”于异乡，终老美国。

郭廷以的性格

在一个社会形态激变的时代，个人的性格更加容易影响个人的事业。如果非要给郭廷以后半生的遭遇找一个唯一的解释，那毫无疑问归结在他的处事性格上。

几乎所有郭先生的门生在回忆恩师的时候，都会谈到郭先生过于严肃的处世风格。比如他的得意门生李国祁，回忆郭先生50年代初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时的风格是：“郭先生对于学生是不苟言笑，永远是一副扑克牌的面孔，身材瘦高，

但是体格并不很强壮，经常穿长袍。”再如王尔敏回忆恩师的时候，也谈到：“郭廷以夫子平日不苟言笑，意态岑静严肃，我们后生都颇为惧怕。其实他居心仁厚，对我们爱护有加，只是难得听到他一句称赞。”李恩涵对郭、王师徒的观察也大抵反映了些实情：“量宇师常常到我们办公室‘查班’，他很有威严，邓汝言、王尔敏等人见到他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吓得不像样子”。

而后来担任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对于郭先生的待人严肃，有些略微不同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郭先生是内向的人，不随便说话，都放在心里，喜怒不形于色，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有点高深莫测，误会可能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刘绍唐先生就曾经对我说过：‘你们郭老板一点都……’。其实郭先生是看人说话，有时候得罪了人，而且他会看不起人，不交不如己的朋友，有点这种味道。这方面让人觉得他很骄傲，孤傲又不随和，从来不会主动和别人搭讪或讲一些应酬话。所以在史学界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这和他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包括黎东方、吴相湘等人，和郭先生都处得不好。”

作为研究人员的郭先生，对于“中研院”的“后勤部门”——总务办，也颇有些值得深味之举，譬如当时接任“中研院”总务主任的赵保轩就曾经向陈三井抱怨“你们郭先生看不起人！”因为他曾经向郭先生表示要来拜访近史所，竟然意外的被郭先生一口回绝说：“不必了！”陈三井由此总结为“（郭先生）就是这种态度，不屑与这些人打交道”，可谓生动勾画了郭先生与研究机构中非研究人员的人际关系。与此也可见当时学者风范和尊严所在，“还看今朝”学界，钻研于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岗位者济济一堂，而不“尊重”这些管理人员，更是绝非普通学者敢为。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郭廷以在和美国学者商谈有关合作的时候，因为费正清、韦慕庭大力促成福特基金会的巨额资助，郭与二者的交往已经相当“应酬”了，但是对于两位美国学者的学生，仍然是不苟言笑，以至于历经三十年以后，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费正清的学生）回忆最初见到郭先生的场面，因为生平罕见而记忆犹新：“记得我第一次在南港与他见面，他的面孔冷若冰霜，三言两语之后就不开口了。那是一个尴尬的场面。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觉得一身都是冷汗。后来在纽约见到‘自我放逐’的他，依然如故，没有

丝毫改变。读到本书（指张朋园所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笔者注）之前，我总以为郭教授的孤寂咎由自取。本书让我们认识了郭先生：一位性情外冷内热的学者。我后悔当年没有多接近他一点。”

郭先生即使重视自己钟爱的学生，也不会表现出半点市恩的姿态，这也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所在。李国祁为了从中学调到研究所工作，借着拜年的机会探访郭先生，“见了郭先生，我们互说了几句百年的客气话，之后郭先生就不讲话，我也不讲话，两个人就这样干坐着，约摸过了快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说：‘听说您要给中央研究院筹备近代史研究所，我到您这儿来工作好不好？’郭先生把脸一板问道：‘你对近代史有兴趣吗？’这下可真把我给问住了，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兴趣可以培养。’就这样郭先生用了我，并要我去找当时在大同中学教书的吕实强先生来所里服务，于是我成为近史所助字号的第一位助理员（相当于大学的助教）。”郭先生在学生面前的“不说话”、“脸一板”绝不会有有什么负面的作用，无非是师道尊严，但是，转到和郭先生同辈的学术同僚之间，这就不能不引发深层矛盾了。

郭廷以的社会关系

在众多学生的回忆中，与郭廷以关系最僵的集中在三位学术领袖身上，这三位分别是吴相湘、黎东方和李济。黎、吴二位先生因为涉及“卖档案案”和“福特基金款案”而与郭廷以交恶，后文中将会详细谈及。

李济正是在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之前代理院长职务的人，郭廷以作为近史所的筹备人和第一任所长，和李先生必然有些接触。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脾气，都有不少人撰文谈及，而当时身处近史所的王萍研究员是这样回忆代理院长的：“李济代理院长，他权力最大，说话的声音最响、最有份量。中央研究院从大陆撤退来台时，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其他的所都是后来到台湾才成立的，史语所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所，该所的院士特别多，当然势力也很大。而台大又以台湾的大学老大哥自居，唯我独尊，李济是台大及考古学界的名教授，气焰之盛

几乎可以用‘跋扈’两字来形容。”

而李国祁回忆郭先生与李济接触的一些细节，史料价值绝对至为珍贵：

他（郭先生——笔者注）非常能忍，即使有人指着鼻子骂他，就算生气也不发脾气。我举个小例子，当时研究员的交通车是一辆中型吉普车，交通车会挨家接所长们上班，我们这些层级低的助理员则在固定地点早早上车。通常是先接李济先生，之后到和平东路二段接郭先生，经常都要停了半天，等司机下车到郭先生家里叫他，郭先生才上车。这时李济先生就在车上骂人，我们听了都很难过，我不晓得郭先生知不知道。有时李济先生当着面骂郭先生，说些风凉话，明眼人都知道是讲他，郭先生就装作没听见。我想，假使郭先生不能忍，近史所老早就被人抢去了。正因为郭先生能忍，有强大的耐力，所以他做学问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门功夫，我没有郭先生这样的涵养。

而对于郭廷以更加不利的事情，是“北大”派最重要的人物胡适之竟然出掌“中研院”。据传言，其个中缘由竟有些荒诞：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蒋“总统”突然亲访“中研院”，研究院因事先并未获通知，无任何准备与接待，令他颇为震怒。朱家骅因而去职，改由胡适之先生接掌“中研院”。胡先生是北大的领袖人物，于是觊觎近史所者日在胡先生身边进谗，量宇师原来与胡适之先生渊源即不深，而今则关系大坏。郭先生似乎也未见有任何跻身之举措，以至于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竟然提到“我不知道他（指郭廷以——笔者注）的学历”，“最好能够出来走走”。

胡适早期对郭廷以的看法，无疑和“北大”、“南高”之间的学术门户之见关系纠葛，张朋园说“这反映了当时这些北派学者的门户之见：他不是我们的人，又没有留过学。在史语所这批出身北大的学者眼中，他们认为朱家骅不应该找‘南高’的人，应该找北大的人来负责。后来史语所很看不起近史所，史语所所长李济和郭先生关系非常差，李济认为近代史研究所充其量不过是史语所里面的一个组，没有必要成立一个所，即使要成立研究所，也应该由史语所

派人主持。”

而郭廷以对胡适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胡适去世以后数年，郭先生在撰写自己的口述自传的时候，回忆早年与梁启超、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交往中，对二者学术上的评价也立显高下：

……后来，我还和梁先生通了两次信，梁先生学问渊博，对每个问题都有他的看法，当时我很佩服他。

胡适先生亦来南高演讲过，慕名去听的很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听的时候很舒服，讲得很有条理，很浅显易懂，惟内容深度不够。

……

而胡适演说有点像汪精卫，听起来很舒服，但抓不到要点。

和胡适的关系淡漠，也表现在郭廷以与胡适的学生群体的关系之中，比如福特基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在王萍的后辈学者眼中本来都是“老实敦厚”的前辈学人，却也对于郭廷以在会议中所提方案“经常唱反调”。

所幸“胡适后来读了一些郭廷以的著作，与郭氏共事数年之后，有了较多的认识。”在郭廷以的辞职风波中，最后还是院长胡适亲自挽留才化解危局。

而郭廷以与胡秋原、沈云龙两位学者的怨情，就未能得以化解。

胡秋原在国民党政治史上也是一位传奇人物：1933年，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他毅然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时年仅仅二十三岁，在国民党内声名鹊起；1945年当列强分裂中国外蒙、损害东北权益的时候，他决然反对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杜鲁门政府，被蒋介石革职；70年代初期，钓鱼岛问题凸显以后，六十多岁的胡秋原又发动与声援了震惊海内外的保钓运动；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曾出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8年他更是首访大陆，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商祖国统一大计，成为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后第一位来访的台湾上层人士，为此被李登辉指使开除国民党党籍，也因此两岸交流史上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

胡秋原在近史所成立之初本来兼任研究员，每个月能够领到福特基金会补助

金一百二十美元，这在当时是比较大的一笔数目，胡秋原也正是利用这笔钱支撑自己创办的一份期刊——《中华杂志》，这个杂志政治色彩相当浓厚，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经济支持，全靠个人捐募在维持。

胡秋原是以定期呈交研究成果的方式申请的福特基金补助，因此，在领取了一年的补助以后，郭廷以按照规定索取胡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时候胡秋原正在和李敖“打笔仗”，在台湾知识界炒得沸沸扬扬，互相指责对方“投共”、“投敌”，尔后这场笔墨之争发展成为一场笔墨官司，打了三十年才见分晓。而此时正焦头烂额的胡秋原因为无法交出研究成果，“一气之下，要郭先生把研究经费停掉，郭先生也老老实实在将每个月一百二十块美金的研究费停掉，《中华杂志》差点因此关门。从此，胡秋原和郭先生的关系就蒙上一层阴影。”这（语见《张朋园先生访问纪录》）是1963年的事情，到了1967年，黎东方借“东方学者会议”影射郭廷以是“中共的同路人”的时候，胡秋原“也加进来笔伐一番”，因为胡在台湾知识界影响范围很广，给郭廷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相形之下，郭廷以与沈云龙两位学者的误会，则更为隐蔽。沈云龙先生被延揽入近史所之后，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出版了《黎元洪评传》。这本书从学术上讲，很有开创性意义，甚至把黎元洪比肩孙中山、黄兴，誉为“开国三杰”，这在60年代初期的台湾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社会上和知识界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有不少人提出要追究出版方近史所的责任，虽然目前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郭廷以具体为此做了哪些事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努力使得这件事情到此结束，没有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迫害。

但是，沈云龙“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王世杰与苏联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王世杰因此对他感到不悦，而这件事影响到郭先生和王世杰的关系，因为当时王世杰是“中研院”院长，郭先生夹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这也使得沈云龙在近史所一直没有任何正式名义。而后来近史所“口述历史”项目有关黄郛的研究中，研究黄郛多年的沈云龙却未能参与，而且事后才知情，因此“他听到之后非常火大，这件事让他对郭先生很不谅解，当场在我（指陈三井——笔者注）面前发了很大的脾气。”

郭廷以的行政习惯

如果说郭先生门生们上述的回忆中反映的比较多的是同情体谅郭廷以的话，那么，对于郭先生的行政能力，评价不可谓不低了。

郭廷以最看重的李国祁，回忆起当年的近史所生活，也在赞扬老师的学术水平之余，谈到了郭先生在行政方面的不足。

首先是处理福特基金会补助的方式不够公开透明，“福特基金的分配，应是大家开会讨论，而不是整天拿着笔，记张三给他五千，李四给他四千。”由于分配不透明，因此造成拿到补助的和没有拿到补助的都有所不满，矛盾也都集中到了郭先生身上。

其次是“老一辈的人可能观念与我们现在有些不同，都有点公私不分的习惯。例如近史所定了很多报纸，常常报纸会寄给郭先生在美国念书的儿子，究竟是所内管报纸的人自动寄，还是老板交代的，我们不得而知。又如近史所前面种了很多茶花，郭先生家院子里也种了茶花，这种公私不分的情形，在他们老一辈人的身上很常见。”

还有一些行政上事情，由于郭廷以的处理方式，导致误解难以释怀。贾廷诗回忆郭廷以与“中研院”总办事处的负责人杨树人之间的误解就是这样造成的：“郭先生要李念萱买一套会客室的沙发，李比较注重品味，以当时的标准，这套沙发价格确实高了点。杨树人非常节俭，当公文送到他那里，他一看这么多钱，就说这套沙发是放在所里的？还是用到郭廷以家的会客室？他实在不应该这样讲。这句话有人传给了郭先生，郭先生听到当然很不高兴。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他们之间的心结愈结愈深。”

后来担任过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在回忆中也谈到郭先生行政能力的缺失，也是那个时代普遍的通病：“也有人批评郭先生魄力不够、优柔寡断，像那时候，大家都公认某某人根本没有做研究的能力，但郭先生就一直没有请他走路，这是郭先生的优点，也是缺点。”

另一方面，生活在白色恐怖横行的时代，钻营不当的人有了用武之力。面对这些“莫须有”内容的小报告时，即使正人君子怀着息事宁人的善意，做法却不

一定为别人所接受，难免被误以为是被小人所欺蔽，李恩涵先生回忆说：

虽然量宇师非常有威严，但他有时未免没有是非观念，专听一些小报告。有一次量宇师为了我和林杰冲突的事警告我（此事全为林杰因“事迹败露”恼羞成怒，主动对老老实实的我而挥拳。我完全是被害人——李恩涵原注），当时林杰是近史所的事务员，东北人，和量宇师的二儿子是同学，原来是海军官校学生，被学校淘汰后到近史所工作，他的职责就是监视近史所同仁，住在单身宿舍的“小楼”（我也住在那边，与李念萱同一房间——李恩涵原注）。那时候数学所有位台大数学系毕业的杨兆庆，脾气很怪，一辈子没结婚，后来1990年代和王玺住在蔡元培纪念馆，王玺和李念萱前些日子先后过世了。有一次林杰监视老杨有无偷听大陆广播，在老杨的门口外贴耳偷听，被老杨开门发现。这件事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又如法炮制，贴耳偷听我和李念萱的房间，我一开门无意间发现而撞见他，他竟耍起流氓，抓着我的领子对我大吵起来，还说我骂他，其实他是恼羞成怒。

后来他跑去量宇师处告状，量宇师不听我的解释，反过来警告我。我自认不是我的错，当时我的自尊心很强。所以这件事让我对量宇师非常反感。我有我自己的风格，虽然我十六岁就离家做流亡学生，为了饭碗不敢过分坚持己见，但我内心却对此一直忿忿不平。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读初中时在山东诸城和济南，当时我的家庭环境还很好，我就反对权威了。我在师大读书时，也是倾向自由主义，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立场，我只是比较欣赏北大那一套自由的作风，对于“官僚”式的作风不满。因此，我对量宇师权威式的警告，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心里很不高兴。因此我到夏威夷大学读书时，我就不给量宇师写信。反倒是他后来主动写信给我，这一点令我非常感动。

郭先生最大的行政能力不足，可能还不是这些时代的痕迹，而是在继承者的选择上，给自己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甚至可以说本无嫌隙的师生关系，却铸成

了郭先生最后十年的困境。

首先是和自己一直倚重的三个学生先后发生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也并非不能避免。比如郭廷以与王聿均的变化：王聿均本是郭先生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的时候的学生，师徒关系一直很好，而且郭廷以成立近史所的时候，王聿均就是以副研究员的身份被聘请的，但是副研究员的身份一直等了十二年才升为研究员。而李国祁的事更让王聿均与郭先生的关系雪上加霜，郭先生一度曾经想让自德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李国祁出任代理所长，遭到学生之中的三位“大师兄”（王聿均、黄嘉谟、李毓澍）的集体反对，而郭先生也不妥协，在出访期间，也不让王聿均代理所长，而是选择大家都能接受的王树槐代理。另外，李国祁似乎很早就和三位“大师兄”失和，在入近史所工作之初，因为编写《海防档》的原因，“有一次星期天上午我（李国祁——笔者注）搬家，下午去印刷厂校对档案，回到所里我报了加班费，结果被诬指为虚报加班费，令我感到相当气愤。”

三位“大徒弟”对郭先生的不满越积越深，加上复杂的历史渊源，矛盾势必难以化解了。而当时不少年轻学者支持李国祁接任所长，如李恩涵回忆“后来我们这些支持李国祁的人，都陆续遭殃，都吃了亏。”因此，李恩涵也认为“量宇师有一件事做得不好：对于所内研究很好的，他不晓得多予鼓励，有些坏的人，他又摆脱不了。他不懂得知人善任，因而被他所亲信的人陷害，这也是他后来不得不离开近史所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由于一些传统的官僚习气，不为年轻一辈所接受；另一方面，郭先生不太能识人用人，他这些行政上的不足，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和学术界一些重要人物关系不佳，导致后来的几场危机，也就毫不称奇了。

“海防档”风波

近史所成立之初，最为珍贵的就是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一部分旧档案。

1955年冬，台湾“外交部”本来准备将一大批旧档案销毁，郭廷以所长得知消息以后，利用一些政治关系征求到了“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和副部长时昭瀛的

同意，转向近史所移交了三部分的档案：前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前清外务部档案、民国十五年之前北京外交部旧档。大概在三个多月的移交中，近史所共取得了二百二十余箱档案资料，这可以说是研究近代中国最宝贵的资料之一。所长郭廷以因此开始筹划档案的整理，派人加以分类，编制目录提要，编写内容提要。

这批资料从1840年到1926年，共计八十六年，是中国对外关系史料中最宝贵的部分，譬如其中的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原本，一度在近史所作为珍稀展品展出了很长时间，后来甚至被“外交部”索要返还。

取得了这么一大批史料，最主要问题就成了如何编辑整理。编纂《海防档》之前，在近史所在美国亚洲研究专家、美国亚洲协会代表饶大卫（David Rowe）的委托下，利用饶大卫提供的一万美元捐助，近史所组织编纂了《筹办夷务始末引得》；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所长戴德华（George Taylor）四千美元的资助下，近史所组织编辑了《中俄外交档》（后来出版时更名为《中俄关系史料》）。

《海防档》包括了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档案文件，共分为五个门类：购买船炮、福州船政局、机器局、电线、铁路。最初参与档案整理的是黄嘉谟、王聿均、李毓澍、李国祁、吕实强、贺凌虚、吕士朋，后来贺凌虚因为考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而离职，吕士朋因为冤狱和转任东海大学离开档案整理，因此又补入邓汝言和王尔敏。最后负责成书的，整理购买船炮档案的是吕实强；整理福州船政局档案的是邓汝言；整理机器局档案的是王尔敏；整理铁路档案的是李国祁；整理电线档案的是黄嘉谟（前三本）和李国祁（后四本）。

参与档案整理的年轻学者们，借助这个机会不仅接触到宝贵的资料，而且也有了研究的专门方向，大多数都在自己负责的档案中提炼出文章和专刊，如吕实强的《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等等。而郭先生对待史料的态度，也对参与整理档案的各位后来的治学路径有极大的影响。

根据李国祁先生的回忆，编辑档案的程序是，先做提要目录，接着才是圈点，圈点是用老式的方法，亦即用红色的印泥盖圈。铁路档案中有一部分是尚未抄写

的原档，所以必须先请人抄写后，再加以圈点。各部分负责人所总结概括的提要目录，郭所长要审阅之后才能定稿。

当时照相印刷的方法是将档案照相后制成橡皮版，再将橡皮版贴在胶片上，然后烧制到锌板上才能印刷。不过近史所的学者们都没有照相印书的经验，在印刷成书的过程中多有不快。吕实强回忆，“因为从事编纂经验不足、影印技术的水准较低，在编校的过程中，因为档案各抄本上面原有修正错漏衍字的黏贴，在摄影时，往往随时脱落了，在烧制印版时，也有时会有剥离。所中为了补救，乃派各部分的编者赴印刷厂去校对烧好准备印刷的锌板，发现有脱落残缺之处，即在版上加以改正。此一工作耗时费力，必须集中时间与精力，整日从事。为此，我曾以一张行军床，住在艺文印书馆的办公室中，时间长达一个月”。

李国祁负责的部分在印刷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发现红色的圈点照相后不清晰，更有的圈点根本未照出来，橡皮版剪贴在胶片上，也常发生错误，再加上圈点的文件十分多，难保不会一点错都没有。这些技术性问题应是印刷厂的责任，但艺文印书馆想藉由此次的机会，掌握承印近史所整个出版品的优先权，于是到处宣扬近史所的档案编得一塌糊涂如何如何。最后演变成我们几个负责编《海防档》的人员，每日拎着装有关档案的皮箱从南港到板桥校对并在锌板上补圈或改正，晚上再将档案带回近史所。我们一方面要看胶片，也要看锌板上烧制出来的东西，相当吃力，真是苦不堪言”。对于承印的艺文印书馆，因为负责人严一萍是中研院“老天爷”董作宾的私淑弟子，大家对于郭先生将印刷任务交给严都表示很不认同，有很多位在晚年的回忆中都认为是董的关系使然。

因为校对场所光线不好，用眼吃力过度，李国祁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苦差事”时，还列举了参加校对诸位后来的视力问题：王尔敏、吕实强视网膜剥落，李国祁青光眼，邓汝言瞎了一只眼。结果未必完全出于一个原因，但是当时校对之苦，可见一斑。

而第一批印制出来的书籍因为质量原因发生的赔偿，吕实强、李国祁、黄嘉谟为此都承担了不小的经济责任，如李国祁每月薪水三四百元，共赔偿了一千多元，每月从薪水中扣除一部分。

事件还没有发展到最高潮，后续引发的震动远非始料可及。

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大陆刚刚结束“苏联一切都正确”的蜜月期，国民党的舆论官员在台湾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谄媚美国。因此，1957年出版的《海防档》，“受制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和美国的密切关系，“爱屋及乌”，印刷成书以后，为了避免档案中间有些刺激西方列强的字眼，尤其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使用“夷”来指代西方列强，纯属多余的添加了些小纸条，导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德昭联名向“中研院”院长胡适写了一封具名信：

.....

先生回来五个月了，可能已看出近代史在南港和其他几所比较起来是如何的不相称，试看它四年来唯一的印刷品，不仅标点错误，尤其第一册封里黏贴小纸条，更传为奇谈！是不是负责人对史料缺乏认识，领导不当，才发生这种现象呢？因为即令此档系受美人资助，也不应有此纸条。且民国十九年故官印行夷务始末，直以夷为书名，内容更多恶声交加，却并未黏贴纸条有所说明，外人从没有以为忤。前亚洲协会代表史麟书博士著书亦直译之，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人穷志短”呢？并且这一纸条的出现，更没有顾及本国最高学术机构的尊严和独立研究的精神。这对于先生和许多前辈三十多年要将汉学中心定在中国的努力，实在是一极大的侮辱。甚至使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在国际上也抬不起头来了。国家最高标准难道就是如此？我们如何遵循呢？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实在不能再缄默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握研究院唯一研究近代史的院士蒋廷黻回国的時候表达这点心意，我们要愧对青年了！因此，我们诚恳希望 先生乘此时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一新耳目，以提倡和振奋研究近代史人们的情绪！

.....

吴相湘、王德昭推荐的蒋廷黻，是当时“中研院”唯一的一位研究近代史为专业的院士，而且毫不夸张的说，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奠基人之一，被推荐为近史所所长，亦并非名实不符之说。

郭廷以与蒋廷黻很早就有工作上的往来，甚至蒋廷黻到清华教书，就是因为郭廷以看到了油印本《近代外交史辑要》后，借助自己时任清华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的便利，向校长罗家伦推荐，而且以清华历史系主任虚位以待蒋氏。蒋到清华以后与郭先生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两人一起去紫禁城西北角外的大高殿查抄《大清实录》。60年代初期，郭因公赴纽约，两位还有聚会，蒋向郭还说了不少肺腑之言，比如蒋一生中“第一知己”不是授其大使的蒋介石，而是最初知遇之恩的罗家伦。

吴相湘、王德昭这封信在近史所中也流传颇广，当时游学德国的李国祁，与近史所同事通信，竟得知“胡适之先生接掌中央研究院。胡先生是北大的领袖人物，于是觊觎近史所者日在胡先生身边进谗，量宇师原来与胡适之先生渊源即不深，而今则关系大坏。日后竟发生郭师被迫上辞呈，胡院长欲加以批准（或云业已批准，只是尚未公布而已——引文原注），使近史所再度陷入危机，量宇师的事业有因此斩断的可能。终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的进言，以及（吕）实强兄等人代表近史所直接向胡院长申诉，方得转危为安。”

胡适院长印象中本来不佳的郭廷以，再加上近史所即将到手的一块“大蛋糕”，终于引发了近史所和郭廷以生命中的一场大动荡。

郭廷以辞职风波

胡适院长收到吴相湘、王德昭3月份的“建议信”之后，并未见有何举措，但是，此中半年肯定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到了这年10月29日，郭廷以向胡适呈交了辞职信。

斯人已逝，辞职原因不可直接考证了，幸亏有胡颂平一直在胡适之身边“充当史官”，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了痕迹：

一九五九年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郭廷以有辞职的信，托胡颂平当面给先生。